

变迁中的

困

惑

与

解

脱

一种社会学思想解析

赵子祥·著

辽海出版社

变迁中的困惑与解脱

困惑与解脱

赵子祥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赵子祥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迁中的困惑与解脱——一种社会学思想解析/赵子祥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0669-873-6

I. 变... II. 赵...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80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500 千字 印张: 20 插页: 5

印数: 1—2000 册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桂秋 于文海

责任校对: 王晓秋

封面设计: 金 明

版式设计: 金 明

定价: 38.00 元

我的人生——用社会学去思考

（代序）

赵子祥

一、人生纵横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儒家的人生哲学常被人们做出世俗化的解析：为人者，生来俱有困惑，间有顿悟。终生学习，仍反躬自问：茫茫尘世，芸芸众生，乾坤造物，何为我有。吾是其谁？吾能何为？报之天地，恩谢父母；行益社会，功利他人；寻其所爱，择其良友；齐家修身，惠泽子孙；功过是非，后人评说；祸福相依，荣辱相伴；奋其毕生，难留千古。综观人生，我正似常人所想，俗人所为，苦思良久，逝者如斯。

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西方社会还另有解说。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自从被驱出伊甸园之后，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和谐亲情就被割裂了，人之原罪的三种典型形态便被永远植入人性之中：对金钱贪欲，对权力饥渴，对性事迷恋。简而言之，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何尝不是这三种罪恶的逐渐合法化过程。即资本主义精神和体制建构的完善，使人们对金钱和利润的追求，成为每个人的正当权力；相伴而至的民主化进程，使每个人的权力饥渴成为可以接受梦想；生物学、心理学和性学的发展，也使人们对性需求的满足成为每个人可以公开谈论的主题和实践。

对人生的看法，西方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从人的生理和心理两大层面，剖析了人的几种层级需求模型。人的最低需求是生理和生存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人的本能需求。在本能的驱使下，人为了生存可以创造工具，使用手段，忍受痛苦和屈辱。先

生存而后发展，无生存则何谈发展。人的第二种需求是劳动和工作需求。因为劳动可以创造价值，获得财富，得以生存，赋以休闲。人的第三种需求是安全和依赖的需求，有安全感才有欢乐和快感，然而人的一生往往总是在烦恼、困惑、忧愁及恐惧中度过的。人需要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需要温馨的家庭，以及和蔼的上司、忠诚的朋友，这种安全的需求也可以视为人生来俱有的，也是人们常说的安全感和依赖感。人的第四种需求是荣誉和地位的需求，这可能是人生的最高需求，人活着不仅为了生存、工作、安全，还需要一种心理的自我满足感以及他人的评价和回报、社会的认同和赞誉，即人需要要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无独有偶，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马克思·韦伯在评价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时使用了三个测量指标，即财富（经济收入）、职业（声望）和权力（等级）。在一个健全正常的社会中，一个有钱的暴发户，在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声望并不高，更不用说取不义之财发家的富人。财富不一定能带来好的声望，权力也不等于声望，但声望可以带来权力，也可能带来财富。因此说声望（荣誉）是比财富、职业、权力更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它显示的是人的社会地位。

谈到人生，就必然涉及时间和金钱的关系以及金钱的功能问题。首先，时间和金钱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许多人看来，时间和金钱的关系可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的观念和思想状态。虽然这一观念在今天仍然有效，但这句话并不反映今天的现实，除非把它倒过来，这如麦克斯·霍克汉姆所言：“如果你认为有了时间，就有金钱，这是一个谎言，因为仅仅有了时间不可能得到金钱。”在现时社会中，失业者、懒汉和退休者都有大量时间，但这种时间不可能生出金钱和资本。进一步来说，过

多的“自由”时间，甚至会导致人生方向的迷失。但还有另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一个人一旦有了钱，就可以买到时间和可以支配别人的时间。这一事实正好可以把富兰克林的名言翻转过来：“金钱就是时间。”

金钱在人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当然是指金钱的功能。按照经济学的解释，金钱有三个经典功能。其一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 的保值功能，金钱使时间得以延长又能引起人们的期望。其二，在社会学家的眼里，金钱与时间的相互作用更加复杂和微妙，它具有支配功能。按照社会学的解释，金钱的典型特征，是其拥有持久和持续的有效性（实用性）。具体来说，金钱意味着可以得到人需求的商品和良好的服务。通过这种效用，它影响着人们的时间意识。其三，金钱还能移动时间维的限度（现在/过去/未来），因此时间不仅是一种经济因素，而且是一种社会因素，具有改变环境、个人境遇的社会功能。

总之，金钱既是一种社会过程的加速器，象征着世界的能动性，又起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指示器作用；金钱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还能通过自身呈现的形式，改变人们的意识。

二、人生选择

人们常把每一个个体人的出身选择，误解为人生选择。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可以选择。因而唯物主义者既不信命，也不信运，相信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是指“机遇”和“机会”。成事者要靠个人的努力奋斗，勤奋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抓住机遇，与时俱进。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网络社会化、产业智能化及经济市场化的社会里，人已不仅是经济人、社会人、单位人，而且是地球人。人生选择空间的极大化，成败几率的平等化，职业选择的多元化，交流手段的信息化，必然带来人生选择的“自主化”。

人生的选择如同一个人对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一样，有理想

化的选择，即可望不可及；现实的选择，即可及不可遇；迫不得已的选择，即身不由己。

选择人生就要有选择的资本，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积累人生选择资本、创造选择资本、运作选择资本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么，选择人生的资本是什么？法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世界上基本有四种可以相互替换的资本，即经济货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货币资本在市场经济社会阶段处于重要地位，如工作收入、财富的积累和继承；文化资本包括主体化的特征、相貌、气质和客体化的特征如享有知识产权的种种精神产品以及制度化的要素如文凭、荣誉等等；社会资本则是在复杂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所占据资源的潜能，如占有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等；象征资本意味着某种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品质如声望和地位，或占有奇异的客体品质如名牌和古董。它们无法相互取代，但可以相互交换。一个人的人生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对这四种人生资本的占有率及如何恰当地使用和支配，如何交换与整合。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座人生选择的坐标，即水平流动的横向选择或垂直流动的纵向选择。横向选择比较容易，可平淡或坎坷地度过一生，完结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纵向选择则比较难，有坎坷并不平淡，这是一种向上流动的选择，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都要最大限度地积累和运作人生资本，或经济的和文化的，或社会的和象征的资本，等等。在任何社会，人向下流动易，而向上走难，人按水平坐标流动则相对容易得多，“尽人事，听安排”，循规蹈矩，随遇而安，就带有一种宿命论的色彩。

人生可以选择，是说命运可以改变。选择人生、改变命运并非成功地获取名利和权贵，人应有志，人贵有志，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在实现或追求某种理想和愿望的过程中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权利，这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和展

示。

人生突变，往往是在受到压抑或激励、机遇或挑战的过程中，审时度势，突然调整自己的人生坐标，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这无疑还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艰难困苦的过程。

人生选择就是在一个充满相互矛盾着的现实社会和感情世界中生活。理想的人生又很不现实，现实的人生又缺乏合理性，那只有尊从事实，这样，现实的合理性代替了理想的科学性，社会事实的实用性代替了现实的合理性。之所以把理想的称之为科学的，是因为科学具有完美性。理想的是合理的并非是现实的，它只是理想的派生物，而理想的才是人生的本质、固有的情感和感情的剩余物。

在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帕莱托的词汇中，剩余物指人生中国有的情感和感情的表现，派生物指个人用来掩饰情欲或赋予一些根本没有理性主张或行为，它是一种以理性为外表的辩解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人是一种无理性、但能理性思考的动物。虽然他们很少合乎逻辑地行事，但总想使他们的同类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由此帕莱托阐发过一个社会学的著名论断，即逻辑行为和非逻辑行为。

对于人生选择而言，也有逻辑行为（理性）选择和非逻辑行为（非理性）选择的过程，用人的一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结果的图表亦可以说明这个过程，勾画出人的一生选择的结果——

第一种：无主观目的，无客观结果；

第二种：有主观目的，无客观结果；

第三种：无主观目的，有客观结果；

第四种：有主观目的，有客观结果。

以上四种中，只有第四种属于真正的逻辑行为的人生选择，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一致，即理性选择行为达到理想结果，但前三种，也可以说大多数的人生选择，都是非逻辑行为的结果。那

种无主观目的却有客观结果的第三种，只能说是一种机缘巧合，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特例而已，故也属于非逻辑行为。

对于人生选择结果的评价，可用社会学的精英理论来解释。帕莱托在他的著作中给“精英”下了两个定义：广义的指社会职业精英，狭义的为社会权力精英。

广义的社会精英，是把一小部分能在自己事业范围内取得成功并达到职业层次较高等级的人生视为精英的一部分。那就是不管他从事哪一行当和职业，只要有显著业绩和成就者就是社会精英，这就是中国人常讲的“行行出状元”。对于人生选择评价也是一样，社会对成功人生的评价也十分偏颇，例如，人们给予每个人一个表明其能力的指数，就像老师在学校给学生不同课程的考试打分一样。对职业上出类拔萃的人给十分，对没有揽到一名顾客的推销员给一分，对真正痴呆者给零分，对百万富翁不分人好坏给十分，对职业收入高的人给六分，对仅仅维持生计的人给一分，对失业者或住贫民窟里的人给零分。对社会名人也能给八九分。说得简单点，精英只是在生存竞争中或事业上得到了高分或在社会“存在”的赌博中交了好运的人。换言之，选择成功人生的人就是社会的精英。

人生选择是成功也好，是失败也好，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平庸，还是浪漫，既是一种社会事实，又是一种社会评价。关键是一种自我认定和自我体验，只要命运共同体中的人（如夫妻）相互认同，就是命运的最终评价。巨富豪门可能厄运连连，贫寒之家却一生平安；门当户对却痛苦厮守，情投意合而不弃贫贱；是辉煌，是暗淡，任凭他人评说，最终还是靠自己的感觉。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人生选择要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认定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人的一生应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共

产党人的崇高人生理想。在现时代，将其表述为一个社会的先进分子和“精英”，他的一生应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已成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最高人生理想，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生最高概括和尺度。

三、我的人生

描述一个人的人生，往往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有修饰的，也有掩饰和规避的。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把自己全部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想法和感觉，完全公之于众，都是一种经过精心加工的表白，都是一种他人的感知、评价和描写，往往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做的和得到的不一样，想和他人的评价不一样。我当然也在其中，毫不例外。只不过我想对自己人生的表述尽量求其真实。

我真的记不清自己从几岁哪年记事，几岁哪年懂事，我只能把我记忆中的东西追寻回来，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得让人看了合乎情理，感到真实。

说来奇怪，我从来记不住任何人的出生年月日，这包括我的父母和妻儿，惟一庆幸的是还能记住自己的生日。这是否可以判断我是一个不孝和自私的人，而我恰恰不是那种人。

1946年1月18日（农历1945年12月16日），我出生在沈阳一个贫苦纷杂的家庭。父亲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出身，没有受过一天的文化教育，他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但却不会自己写。他很精明敬业，能吃苦而又勤奋。他天生有一副经商的头脑，但一生中也只做过几次小本生意。

据父亲讲，我的家族是辽中县的旗人（满族），到父辈时已家道中落，一贫如洗。祖父母早丧，我连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按家谱的排序，祖父大概应叫赵祥×什么的，因为当时的家谱排序是“庆祥天子座，落地满朝纲”。按这个系谱，父亲本应叫赵

天臣，不知为什么又叫了赵国臣。父亲兄弟五人，因为我有四叔、五叔，大伯、二伯可能是早年夭折，我从未见过。

据说父亲很早就独自一人闯荡沈阳，先做力工，后进入奉天兵工厂当了工人，再后来又被日本人抓劳工送到北满绥芬河修地堡，因为他是管道工，懂技术又有心计，担心修完地堡会被日本人全部杀害，侥幸和几名劳工一起逃回沈城，否则尸骨早埋在寒冷的北疆。

据说父亲曾沿街收过破烂，还给日本人家里当过勤杂工（当时叫博役），因而学会了饲养热带鱼的本领。他最值得炫耀的一段经商往事是曾在伪满时期的长春倒卖那些现在看来最原始的手摇计算器。后来解放军兵临城下，围困长春，在最危急的时刻，父亲是因为我生病哭闹外出购药，看到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感到局势混乱，才突然决定带我母子仓皇出逃，从此父亲经常叨念我福大命大，如果困在长春，全家人早已饿死他乡。所以父亲把我当做福星和救命恩人，对我似乎格外器重。

这些只是我听到的，我后来看到和记得的往事，是父亲解放后在沈阳的大东边门和大东门开过一个钟表修理铺和经销热带鱼的“同乐鱼店”，以此来维持我家的生计。

公私合营以后，父亲惨淡经营的修理铺和鱼店在三年困难时期倒闭，父亲被迫到沈阳小河沿附近的医大二院做水暖工人，当时的家境已极为窘迫，由母亲一人苦苦地支撑着。

我的母亲叫白桂珍，是辽中县肖寨门镇一张姓大户人家子女，后外祖母改嫁，母亲的姓氏随外祖母姓白。因为我在家中是长子，外祖母对我疼爱有加。

母亲是一位文化女性，一生遭遇十分凄苦，下嫁父亲后从未有过一天的安生日子，父亲对母亲十分专横，脾气暴躁，这使我对父亲的另面非常憎恨，想亲近他，又远离他。

我认为把天下所有赞美母亲的词汇全冠在我母亲的头上也不

为过。她贤德勤俭，治家有方，她含辛茹苦，望子成龙，我从她的话语和眼神中感知到她把一生中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常为她的遭遇和困境愤愤不平，心里总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对得起母亲。她能把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抚养成人，可谓受尽羞辱和艰辛。

我上小学那年才年满六岁，按规定应该七岁入学。老师看我长得个子较高，对答如流就没有细看年龄多少即同意入学。上学那天，我背着书包和同学们列队走进教室，别提有多么幸福和快活，学校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新鲜可爱。下课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爬上单杠逞能，突然，我在同学们的欢呼中从单杠上摔了下来，昏迷过去。老师和同学把我弄进学校的医务室，不久就清醒过来，没有摔伤，值得庆幸。但我的举动引起校方关注，细查我的入学登记后，第二天就把我母亲找来，逼着母亲把我领回家去，原因是我的入学年龄不够。第一次上学梦就这样破碎了。直到第二年我才进入莱市小学（现在的小河沿路第一小学）。

在小学校里，我由一个顽皮不听话的坏学生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好学生。有个年龄大的班主任发现了我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把我选为班长，让我协助老师管理班级。

在小学时期我显露了音乐和体育才能。我是学校合唱团的指挥，在区里和市里的比赛中都获过优秀指挥奖，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发给我的证书和奖品，自认有艺术天分。

我虽然是穷孩子堆里长大的学生，但我还是在各方面显得与众不同。母亲非常用心制作我的穿戴，她为了不让人家瞧不起我，总是用她和父亲的旧衣服为我改制新装，每当我穿上一件“新衣服”，都会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叹服，我的虚荣心也一天天地被培养起来。在小学六年级时我当时才十三岁，感到自己已经成熟起来，心中有了一点模糊的理想和目标，那就是要当一名有影响有地位的人。

在小学期间还有几件事我记得清楚。一件事是学校要组织看电影，我到大东菜市场去找母亲要钱。在菜市场里我绕了好半天才找到母亲。那是春节前极寒冷的一天，我看见母亲穿着一身脏衣服坐在一个板凳上，身前放着一个大水盆，在用一把刀在水中认真清理猪头上的毛，手冻得通红。难道这就是母亲的工作？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为了我读书、养活一家人不得不做这样下贱的脏活。她抬头看见我苦笑着，用那冻得麻木的手好半天才从身上掏出一角钱，我当时十分心酸，霎时好像懂事了许多。由此，我对贫苦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

记忆中的第二件事是小学毕业那年，我自以为很有音乐天赋，决定先报考音乐学院附中，将来当一名歌手。在考场上我唱了一首歌，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第一句叫“二呀么二郎山”，自觉得唱得很好，实际上拍节和音律都不对。老师又看了看我的手说：“你不适合搞音乐，你的手指不细也不长，更不适合弹钢琴。”我没有被录取。但我也没有灰心丧气，又决定去报考辽宁歌舞团。

我的舅舅白杰是辽宁歌舞团的一位作曲和乐队指挥，当时还有点名气，因为我长得像他，别人就叫我小白杰。他当时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我认为有他暗中指点，我又会些体操功夫，一定会考上。考试的题目有两个，一是即兴按要求表演小品，内容是在街上看到两个人打架，我从中劝阻，左拦他，右劝他，不慎我被打了一个大嘴巴。我的表演很拙劣，自己也很不好意思。二是让我跟一个舞蹈演员模仿一段藏族舞蹈。我跟不上拍节，动作生硬，表演完我几乎无地自容。看来从事文艺的梦破碎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大打击和耻辱。我哭了，哭得非常伤心。

中学时代在我人生的记忆中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但那是我人生中经历生活苦难的年代。

1959年我步入沈阳市第六中学读初中（现在的周恩来母校），又重蹈了小学时代的覆辙。开始没有人注意我，后来又当上了班长、校学生会的体育部长。

在中学时期我爱好体育，尤其是体操和乒乓球两项运动成绩突出。体育老师都喜欢我，连校长和书记都愿意和我一起打乒乓球。每天课间我独自一人站在学校大操场的领操台上带领全校师生做间操，伴随广播体操的乐曲，我英姿勃勃，动作标准，一下子就成了全校的知名人士，这使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

然而，老天无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本来贫寒的家境又雪上加霜。我们兄妹四人都在成长期，吃饭已成为我家的最大难题。寻找到食物，吃顿饱饭已是当时最大的生存需求。记得有一次周日，我带领年仅十岁的大妹妹和八岁的弟弟，徒步十几公里由大南门出发，过浑河桥，涉过齐腰深的水，满身泥污到菜地去做力工，在满是泥水的菜地里采摘茄子和西红柿，足足干了一天，分到五斤西红柿和五斤茄子。我和弟弟妹妹带着劳动果实，拖着疼痛的双腿踏回家门，母亲和外祖母又是心疼又是惊喜，母亲看着我们流下了酸楚的泪，而我心里十分自豪地想，我能成家出力，我能自立。

从此以后，每逢周日，我就和父亲及其他亲戚一起乘火车到农村菜地去拣白菜帮子，拾野菜，挖田鼠洞找粮食。回到家后把野菜和大麦米一起煮粥喝，当时喝得很饱，但一会儿就饿。母亲千方百计、费尽心机为一家人做吃的，甚至把光秃秃的玉米棒子捣碎做饼子吃，我尝到了人生挨饿的滋味。母亲一天天瘦下去，我们仍长得很结实。

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充满了乐趣。我爱好文学，喜欢做诗，我与我的班主任关系非常亲密，他看我有文学天赋，经常在课余时间 and 晚上为我们讲解文学作品和戏剧。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讲评，我写的许多作文如《赏菊》、《我的母亲》

均获得过赞誉。我当时的人生最高理想是将来做一名人民教师，我为追求这一人生目标十分努力。我家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斗室住六口人，没有学习的条件，只好晚上在路灯下看书，是典型的街角少年。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被学校保送到沈阳市第一高级中学读书，高中时代的生活又开始了。

在读高中时期，我是一个惹人注目和出类拔萃的学生，入校不久我就被学生会选择为全校的文体部长，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我在作文竞赛中也常获第一名，成了学校中有名的才子。这时我的业余爱好有两个，一是打乒乓球，二是练体操，不仅被选入校队，而且是区队队员，并且考入省业余体校的乒乓球队。在历次乒乓球比赛中，尽管我的基本功好，但我临场比赛总是求胜心切，状态不佳，是个常败将军。

我当体育明星的梦又破灭了，我开始在文学上下功夫，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姓文，是个四川人，他书生气十足，对同学要求很严，由于他讲课用地道的四川话讲，同学们经常取笑他，我很敬佩他的学识，他对昆曲颇有研究，他如果能在大学教书一定非常称职。由于我的语文成绩好，他对我经常辅导，增强了我学文的信心。

读高中时，我尽管在学校是个出众的人，但我的家境不好，生活较为困难。尽管我的母亲为我上学准备了让弟弟妹妹们羡慕的最好的饭菜带到学校，但和其他人一比，简直太差，所以我不愿与同学们在一起吃饭，只能躲到一边吃我的美餐——大饼子加咸菜。

我家距学校很远，我非常想有台自行车，最终父亲满足了我的愿望，在破烂行花三十元钱买了一辆廉价的旧车，修理好供我使用。当时我的心里美极了，但这辆破车总坏，时常让同学们讥笑，又没钱修理，只能丢在一边。

临近高中毕业时，我在人生的重要关口遭受了再一次重大的打击。

这个打击是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落榜了，我的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我和母亲抱头痛哭，我只有一个念头，真的对不起母亲的一片苦心，甚至想到了死。我在家等录取通知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我等来了辽宁大学外语系的录取通知。全家转悲为喜，奔走相告，老天不负有心人，我有了人生的机遇，我家祖祖辈辈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大学，多少为母亲争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我没考上人大的原因是我的学生鉴定不好。据说我的那位讲政治课的班主任在我的毕业评语上写道：该生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浓厚，家庭背景复杂云云。在那个讲阶级出身的年代写上这样的话还怎么能考上中国人民大学。

受到这次打击，我真的成熟起来，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太天真幼稚。好歹走过了这段人生旅途，一切等待大学生活的开始。

那是1965年9月初的一天，我独自一人扛着行李来到辽大校园，找到外语系的报到处，高年级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令我特别高兴的是有一名高年级69届的俄语专业女生高黎明（现在是我的妻子）认识我。我在一中读书时曾去过她家，是由一名语文老师引荐去的，目的是为她父亲写一篇报导。这位我后来的岳父大人是当时医大二院的眼科名医。在她家里我曾看过她一眼，端庄大方，气质高雅。我为她父亲写的报导后来公开发表，题目是《百岁老人重见光明》。我一进入大学门槛便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我在大学的生活十分艰苦，每月只有二十多元钱的生活费，其中十五元是伙食费，余下五元是零用钱。当时我只能买肥皂洗脸，经常吃不饱肚子，很多农村来的同学都有助学金，日子过得比我好，零用钱也多。我因为好面子，太虚荣，生怕别人看不起而没有申请助学金。多亏这位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

在食堂相遇时她好像发现我吃得少，就经常“施舍”给我她剩余的饭票，我对她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

刚上大学，一切对我都很新鲜，宽敞的校园，壮观的图书馆，幽静的林荫小路，令我向往的教室和诱人的食堂。生活周而复始，宿舍——食堂——教学楼——图书馆，四点成一线。

因为我在一中读书时学的是英语，我的专业课有一定的功底，学习对我来说并不累。我在中学又当过学生会的干部，因而到了大学也被继续任用，辅导员让我做外语系民兵连的副连长，那时的建制是军事化的，外语系就等于一个连的建制。于是我在外语系又成了一个众人瞩目的人物。我真正注重自己的衣着是从此时开始的。但我的家境仍无好转，父亲下放到辽中县邮电局做工人，一个妹妹在郊区农村成为下乡知识青年，另一个妹妹已在我上大学后随我一名高中的同学（柬埔寨华侨）远嫁香港，一个弟弟正在念中学。这么重的家庭负担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曾有一段时间在沈阳毛料服装厂上班当会计。她为了供我念大学省吃俭用，经常通宵达旦为工厂手工缝纽扣、纤裤脚，挣一点手工费，生活极其艰苦。母亲怕我在大学吃不饱，每周回到家里尽量炖一点好菜，我记得当时最好吃的菜是买一点肥肉，熬出油来做云豆炖土豆。我家一刘姓邻居也很喜欢我，他们常接济我家，特别是一到我回家时就端出好吃的让我吃。他们常夸我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有出息。我的母亲也为我骄傲。

为了不辜负家人的希望，我学习很刻苦，做一名系里的学生干部可以说能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我的人缘挺好，系里的同学对我十分友善。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政治上我还很年轻，不成熟，缺少政治敏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我却一点没有感知。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我们受到的是革命的教育，看的是革命的电影，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来想、来说、来做，力争做一名走在时代前头的人。